盧佩琼

個人簡介

1926 年生於廣州，祖籍佛山三水。少時就讀四十四小學。父親去世後，跟母親回鄉。後隨搶救隊到南雄，入讀廣東兒童教養院第六院。小學畢業後，升讀力行中學。初二時，參加青年軍，任職救護隊。和平後，第一批復員回廣州，並於廣州女子師範繼續求學。1949 年，師範畢業。

童年生活

我叫盧佩琼，名字是牧師起的。1926 年，在廣州市海珠路普濟街的家出生，三水范湖墟是老家。在我出生的時候，家人均住在廣州。

小時候，我對海珠橋印象非常深刻。它建於民國二十三年。我聽說那時有人擄走一些小孩，用他們來建海珠橋的橋躉，說這樣能保護整座橋，讓橋耐用一點。我覺得這樣很殘忍，也怕得不敢踏出家門口。

六、七歲時，我開始讀書。我沒有讀過所謂的「卜卜齋」或幼稚園，[1]一開始就讀小學。第一間學校是大新街的四十四小學，它是一間男女混合、頗全面的市立小學。那時四十四小學除了有國文科，還有算術、音樂、圖畫、常識和體育，但好像沒有尺牘科。上學時，我們要穿校服，天熱時男同學穿白衫，女同學穿黑裙。上童軍課時，要穿童子軍裝，不過童軍課好像四年級才有，我也曾上過。

那時早上起床，母親給我們一、兩仙去買蕃薯吃，或者在街上隨便買一些小食當早餐。小學四年級時，日本仔打到廣州。廣州淪陷後，我便沒有讀書了。

廣州淪陷

1938 年，日本仔轟炸廣州，炸彈像一個大冬瓜。當時我們看見炸彈從日軍飛機掉下來。我年紀很小，只有十歲左右，看到轟炸，也不知所措。轟炸時，警報會「砵、砵」地響，大家便走到防空壕和防空洞避難。那時我只知道那些是政府挖的洞，不清楚是什麼地方。敵機來時，大家拖男帶女地走，我梳著兩條馬尾辮，也跟著大人走。如果你在吃飯，別以為可以

[1] 卜卜齋為廣東俗語，指傳統私塾。

吃完飯才走，那時必須馬上就走。我有多次逃難的經驗，每次都很驚慌。聽大人說走啊、走啊，我就跟著走。那時我養了一條狗，還帶著著牠走，好像大家生死與共，不過有些大人罵我，說：「連自己都無法好好照顧，還要照顧一條狗？」但我確實捨不得，於是就帶著牠一起走。但是大人堅持走難不准帶狗，認為很礙事。最後，我只好流著眼淚把牠遺棄，從此再沒有見過牠。

廣州淪陷時，父親去世了。他原來很有錢，是西土藥材行的行長，有私家車，那時有私家車是件很不簡單的事。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！日本仔轟炸廣州時，父親在店裡被炸死了。那時年紀很小，我只記得母親把所有首飾拿到中華中路的老字號「周生生」變賣了，「周生生」就在中華戲院附近。媽媽隨後帶著我和兩個哥哥回去鄉下三水，姐姐比我們大六年，去讀護士，沒有跟我們回鄉。

家鄉三水

小學二年級遇上廣州淪陷，我跟著家人回三水老家去。那是我第一次回鄉。我們不懂耕田，生活貧困，只靠變賣家當維生。那時生活真的很艱苦，我們不時等那些種蕃薯的農民挖完蕃薯後，就去挖餘下的小蕃薯。下雨後，蕃薯苗長出來，我們就在蕃薯苗下挖蕃薯。此外，花生也是在雨後長芽的，現在說那些芽有毒，但當時誰會理會它是否有毒？總之吃飽就是。母親常說：「窮在路邊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」，接著便哭起來。她是爸爸的第四妾侍，其他姊妹已經雞飛狗走。我們全靠母親，才能長大成人。

逃亡的時候，日本侵略者拿著鞭子指揮我們，當時我們像牛，鞭子在那裡，我們就走到那裡。那時候，我很淒慘，沒有吃的，也沒有穿的，而且患了瘧疾和痢疾，頭髮全掉了。我病得快死時，家人捨不得吃，卻用幾個仙買來牛肉，煮成牛肉羹給我吃。那時我們一家很困苦，真是飢寒交迫，奄奄一息。

後來日本仔來到我們家鄉中巷村，到處姦淫虜掠。他們見到年青婦女就強姦，見到雞就捉，見豬就刺死，見到牛就拉走，這些事情我全目睹過。他們用槍頭劍到處亂刺，不當我們是人。我那時還小，見他們來了，就躲在床底。大哥已是青年，很難找藏身之所，只好躲在禾稈草堆裡。有一次，有一隻雞突然走進草堆裡，日本仔用槍頭刺，幸好大哥很快地把雞捉起，恭恭敬敬地把雞奉送給日本兵，這樣他才逃過一劫。這可是真人真事！

日本仔到處姦淫擄掠，作惡多端。有些老婆婆逃不了，日本仔竟用一對鞋打腫她們的下陰，然後強姦，非常殘忍！他們甚麼也不管，到處蹂躪，弄得鄉下滿目瘡痍，一片荒涼。我們家被日本仔破壞，只剩下兩個廚房，我們吃飯和睡覺，都在那裡。

不久，搶救隊來了我們村。他們是共產黨派來的，共產黨在那時的確立了功。當時我不知道他們是搶救隊，因為他們沒有表露身份，我們只知有些老師和大姐姐來了，準備幫我們這些淪陷區的孩子找學校讀書。鄉下人看見有些衣著光鮮的人來了，就當他們是老師，到處說：「老師來了，老師來了。有幾個老師，有男有女，很年輕的，準備帶淪陷區的孩子去讀書，還有飯有粥吃呢。」他們逐家逐戶宣傳，如果有孩子願意去，就會登門拜訪，跟他家長商量。

當時大哥盧世雄已去了少年營。少年營是教養院的前身，由吳菊芳院長創辦。哥哥在少年營和盧佩蘭在一起，後來他們一個讀智銳中學，另一個讀力行中學，因此就分開了。二哥在鄉下不懂耕田，家中只有母親一個寡婦撫養我們幾兄妹。母親聽到宣傳後，便答應讓我去教養院。當時大家不知道搶救隊還會不會來，能送走一個就一個。

搶救隊很快便離開，村裡只有我這個小孩跟他們走。那時家裡沒錢，母親聽見有書讀，就做了一套新衣給我，說讀書人不能衣衫襤褸。她將僅有的一籮穀賣給賣魚佬阿地，並用得來的錢買了一塊布，連夜給我縫製衣服。離開時，母親一把眼淚、一把鼻涕地送我走。她給我一套新衣，又給我一些毛背心，怕我著涼。她還給我一些零用錢，但搶救隊說教養院照顧衣食住行，不用花錢。

離開時，搶救隊跟母親說，會去三水蘆包對面的掌岸，掌岸對面好像還有一個三水馬房。當時還有一些嶺南大學教會孤兒院的孤兒同行，一起前往掌岸。搶救隊安慰我們說：「我帶你們去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，免得你們被日本仔嚇壞。那裡有書讀，也有衣服穿。」或許他們是地下黨員，所以沒有交代具體地點，也不敢說那裡的物資由政府提供，只說是善長捐贈的。

沿途我們要衝破日本的封鎖線，不能讓太多孩子一起走。他們叫我跟著鄰村幾個小孩一起走，但我們彼此不認識。第二天早上，天還未亮，便到掌岸。原來母親走路到那裡送我上船，好像來見我最後一面那樣。起初我不知母親會來，後來聽到有人說：「有位老人家在那兒。」我一看，是母親。她在岸邊揮手，聲淚俱下，捨不得我們走，或是因為不知道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見，也不知道此行是福是禍。

那時船是用竹篙撐的，船夫用力一撐，船就前進一步，船夫好不容易才把我們送到目的地。船上食物不多，有些人吃得較快，說吃完了，接著就隨手搶其他人的食物吃。我們花了數天，沿北江去南雄，在南雄集合。那時教養院全名是「廣東戰時兒童教養院」，我去的是第六院。孔姑娘送我們到教養院後，就走了。她好像是教會的人，也可能是為了掩護我們，才親自送我們去教養院。孔姑娘眼大大，短頭髮，為人和藹可親，沿途非常照顧我們。

教養院第六院

我在第六院時，丁老師負責教導低年級的班別。[2]初到時，我很掛念家人，常常哭，有些入住時間較長的同學，便安慰我說：「不要哭，我陪你玩，以後我們會回家的。」那時我很不習慣過離鄉別井的生活。

六院靠近河邊，山上有很多松樹，我們就是住在用松樹皮搭建的茅棚內。六院的房屋用瓦片搭建，有點像教堂。要知道，基督無處不往，偏僻的地方也有主與我們同在。每院原則上有一千個兒童，但有時有些兒童過世了，而新院童尚未來到，所以人數會不足一千。教養院有甲、乙、丙、丁班，每班分別住一個茅棚。它又分區，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區，分別在不同地方。院方根據孩子的學歷及年齡分班、分區。我在廣州市曾讀一、二年級，院方把我編入三區二年級，二年級的兒童比較年長。五區孩子則較年幼，他們經常撒尿。那些孩子從五區逐漸升上去，升至一區，一區就是畢業班。

我們睡覺的時候，同學全部睡在一起。那時大家天真無邪，睡覺時不會「你摸我、我摸你」。我們的床很特別，院方把竹子一分為二，然後以棉花把它們綁在一起，做成竹排，也就成了我們的床。我們睡上面，就像睡在地面上——冷冷的、硬硬的。睡覺前，我們要由高至矮排隊，最矮小的男生排在女生隊伍前面，然後依次上竹排睡覺，男的一邊，女的一邊。記得睡在年紀最小的男生旁邊就是女生，他們隔著一條隙縫，稍為分開一點。老師晚上會來巡視，看看有沒有人撒尿。

教養院設有班主任。初到教養院時，有位女老師叫何仁信，一些俏皮的男孩叫她「無人信」。因為「何人信」，即沒有人相信你。我又記得教古文的老師叫湯伯賢。當時我們用毛筆寫字，紙張、筆墨由教養院提供。記得當時的紙，好像現在的原稿紙，如果寫大字的話，就

[2] 丁老師指丁佩玉老師。

用那些像宣紙的白紙，然後套一個字格練字。教科書也由教養院提供，書中全是一些恭維國民黨的內容，因為當時是由國民黨統治。他們講三民主義，教科書內容均帶有革命性質。

教養院生活很有規律，每天都有步操和體操等訓練。早上六時，有人吹號提示我們起床。我們要迅速起床和集合，再去河邊洗臉，如果遇上大風大雨，就去井邊洗臉。洗臉後，會吃早餐，吃完早餐便正式上課。那時我們有很多科目，除了古文、算術、國文、三民主義、中國命運（這科好像中學才有），還有童子軍、音樂、美術、勞動。我沒有特別喜歡的科目，有時上課會睡覺，有時又掛念家人，成績不是很理想。當時院方會公布成績，這對成績好的同學有鼓勵作用。

中午，我們會午睡。大概二時，又再上課。下午的課多是術科，如勞動、體操、童子軍等。上勞動課，我們會種菜、理髮、縫紉或打草鞋，記得我參加了理髮組。當時我們均穿草鞋，需要自己找麻繩來編織。有些同學不喜歡穿草鞋，就乾脆赤腳。我有時也會赤腳，但在軍訓時，我們必須綁上腳綁，不能赤腳。那時姐姐在曲江當護士，曾郵寄一雙涼鞋給我。有些同學見到，就說我很威風，有一雙鞋子。我不想標奇立異，人無我有，只得把鞋子穿至破爛，又叫姐姐不要破費再寄鞋子來。

下午四時左右，便是我們的自由活動時間。女生利用這段時間來縫補別人的破衣，或去散步、唱歌。我們多在晚飯前洗澡，因為晚飯後天氣很冷，有時還會下雪。那時我們去河邊洗澡，男的一邊，女的一邊。一些年紀小的同學，因怕身體支持不了，便先跑步埶身，再迅速跳進河中，有些同學則一邊唱歌，一邊洗澡。當時的集體生活，無論是否習慣，也要適應。當時我年紀很小，又天真，以為人們做得到的事，我也做到。有一次，我在河邊洗衣服，當時山洪暴發，同學魏素華被洪水沖到河裡，差點一命嗚呼。後來我們數人合力，才把她救回來。真是駭人！那時我也幾乎被浸死，身體浮在水中，幸好抓緊岸邊的樹枝，才慢慢爬回岸上。此事發生在坪石，該是稍後一點的事了。

此外，所有學生均參加童子軍，童軍服由教養院派發。當時的童軍服，男女相同，只穿短褲，下雪時也是一樣。至於髮型，女生要理「西裝頭」，即短髮，男生多是「和尚頭」，這樣比較方便、乾淨和衛生。當時我屬理髮組，要為同學們理髮。記得有些同學對我說：「給我剪一個陸軍裝便可，不要剪得太短，否則就像和尚了。」

晚上，教養院沒有電，要點油燈。晚上飯堂人不多，自由活動時我多在那裡溫習。當時一位姓陳的男老師很照顧我。他用自己的錢，給我買了一盞油燈，又給我一些買燈油的錢，叫我好好溫習。油燈其實很暗，只有數隻螢火蟲的光度，但勉強可以供我閱讀。

南雄的日子，雖然挺艱苦，但還是有飯吃。我們在飯堂用膳，逢星期六才有豬肉吃，平時多吃素。那時我們會這樣唱：「禮拜六是我們大活動。」因為每逢週六，我們便有大活動。那天除了有豬肉吃，晚上八、九時還有晚會。晚會時，我們會自彈、自唱、自演。如果有親屬在南雄附近，星期日還可以外出。當時若想外出，只要事前告知老師目的地便可。我們由第六院步行去南雄，至少兩小時。同學多結伴同行，走起來也不覺時間長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會覺得很辛苦，當時卻不覺得。

教養院的糧食，由廣東省賑濟會提供。它由船隻運來，但一旦發生洪災，船隻停航，白米運不來，我們便沒飯吃了。那時候科技不發達，沒有引擎，船靠人力推動。所以遇上急流和山洪，我們就要斷糧。但我們很天真，沒有飯吃，便在床上唱聖詩。有些年紀稍大的女同學，沒有飯吃，讀書也不成，就跟當地農民結婚，當人家媳婦去了。同學因為糧食不足，也去找些蕃薯之類的食物吃，坦白說，即去偷農民的蕃薯。通常是男生去偷，女生怕死，不敢去。同學偷東西時，會用暗號，偷不同東西，就用不同暗號。例如偷茄子是「捉日本仔」，因為日本人身材比較矮小，像茄子；偷花生是「去找痘皮佬」，因為花生是一粒一粒的，像疙瘩一樣；偷蕃薯則是「挖地雷」。這些事不能讓老師知道，但女生很愛打聽是非，很容易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。如果農民發現同學偷東西，會以粗言穢語罵他們，還向學校投訴，讓學校懲罰他們。男同學多在星期六、日，去偷東西吃。

雖然吳菊芳院長立了大功，把我們搶救回來，讓我們不用死於日本仔的屠刀下，但那時天花肆虐，有些同學因此而死。例如有三個同學生病住院，很多時只得一個能回來。教養院雖有校醫室，但醫療水平很低，藥物又不足，只有一些成藥而已。那時不少同學死於痢疾，有些死於瘧疾，還有些死於天花。我幸好未被傳染。記得那時有一個地方，叫「死仔洞」，洞很深。院方把病逝的同學推下「死仔洞」，撒灰撒粉再埋葬。那時教養院照顧的孩童太多，每院一千人，七院共七千人，要防止疫症蔓延，又要處理病死的人，非常困難。在那個非常時期，儀式只能從簡。

我們經過日本仔轟炸的時期，又經過疫症肆虐的歲月，都死不去。如是同學的關係非常

密切，常常聚在一起。師生關係也很好，老師和我們一起生活，無分彼此。最記得是班主任湯伯賢，他有嚴重的腳臭病，但竟要我和另一位同學侯次璋，幫他洗那塊裹腳布，真是難忘！我想因為我們是女生，他就找我們幫他。十隻手指有長短，有些老師就是這樣子的。

我在六院時，曾與家人通信，不過次數不多。在曲江時，我收到母親的消息。有一次，我頸上生了毒瘡，告知姐姐，姐姐叫我去見她的同學鍾秀如，她在南雄醫院當護士。我徒步到南雄縣城求醫。那時幸好有些同學有空，願意與我結伴同行。醫生給我一種顏色很黑的藥，我用了藥，星期日還要回去覆診，直至痊癒。

記得六院曾組織一個兒童劇團，我在三年級時也參加了。我曾演出《古廟鐘聲》，故事內容反映我們教養院的生活及淪陷區兒童的情況，我演一位姐姐。四年級畢業時，教導主任陳主任給我一根拐杖，稱是「授杖留念」，最後讓我代表應屆同學放下那根拐杖，象徵我們學業有成。

力行中學

我在院住了兩、三年，完成一區的學習後，便升上力行中學。當時能入讀力中，是比較威風的事。同學按志願排列學校，每人有三個選擇，第一是力行中學，院長會親自選拔學生；第二是北江師範，簡稱江師；第三是北江職業學校，簡稱北職。我選了力中為第一志願，因為它比較出名。

那時院長會親自挑選學生。考試時，我們在試場裡集體考試，好像考中國命運、三民主義等政治科，還要考數學、地理、國語等。考試地點在黃崗，我們先集訓四、五日，其間要進行辯論，看看你的儀態、口才，要求十分嚴格。集訓就好像軍訓一樣，我們在那裡住宿和做功課，到最後兩、三天，就考試了。考完試，差不多即時知道自己的成績，因為有老師在場。吳院長不會與我們談話，因為學生很多，她平時在辯論會和晚會，都大概瞭解同學的表現。放榜後，老師會通知我們。我這一屆有七個院約幾百人報考力中，最後取錄了約一百五十人。他們被編入甲、乙、丙三班，王才全在丙班，我在乙班。當知道自己考上力中時，真的非常高興，我對自己說：「我讀上中學了，又長一歲了！」這樣我便離開六院，前往曲江。那時力中在黎市，後來在黃崗興建新校舍。

力中的生活跟從前差不多，身邊的同學都是從教養院進去的，初時女生不是很多。如果

與六院的校舍作比較，力中確實好一些，畢竟它是中學。那時女生住一個宿舍，男生住另一個宿舍，從初中到高中，我都住同一宿舍。宿舍比較正規，是磚瓦建築，不再是棚屋了。

在力中，最記得梁楓老師。他教我們演戲唱歌，也是地下黨員。他從不稱呼我們為學生，而稱為弟兄姊妹。他教我們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」，不過那時有些同學默書時卻寫成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豬肉」。他見到就說：「這反映現實。」後來有人來捉他，他離開後，我才知道他是地下黨員。離開前，他在房門上貼了一句說話——弟兄姊妹們，我要離開了，祝你們身體健康。

四十年代是抗日戰爭的高潮，力中又有些地下黨員，我多少受到影響，產生了民族感情和抗日愛國情緒。我回來讀女師時，因為懂得一些與共產黨有關的東西，幾乎也被捉拿。至於力行中學的老師，當時都受到影響。記得當時老師教我們動的邏輯、靜的邏輯，又教我們唱愛國抗戰歌曲，如《我們都是神槍手》、《遊擊隊之歌》、《太行山上》、《四萬萬同胞》等。現在的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，亦曾唱過。我很難說自己是不是力行中學裡思想進步的同學，我認為自己只是一般同學而已。我只管讀書，沒有參加進步組織，也沒有參加過宣傳隊那類的組織。

在力行中學時，我受到老師看重，曾獲得一條紅絲帶繃帶。在紀念週會上，我負責說「紀念週開始，全體肅立。」同學便跟隨我的指揮，全體肅立。1944 或 1945 年，我讀初中二年級，學校情況非常困難。為了避開日本仔，我們徒步進入農村，負責運輸的人就坐船，沿著江水走，不料途中遭到大刀隊搶劫。那些大刀隊又叫「自衛隊」、「插死隊」，他們截停我們的船，搶光我們的公款和公糧。當總務的梁主任被殺死，他的女兒才剛滿月。他太太的哭聲，非常淒慘，我至今難忘。那時我的衣袖較長，便剪了一些布，造了一頂帽子給他女兒。經此一劫，金錢財物全被搶走，我們都吃不飽。後來我在黃崗參加了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。

加入軍隊

當時學校的情況十分艱難，國家又需要我們，加上學校也動員同學從軍，於是我和很多同學決定投筆從戎。那時我十七、八歲，年紀不算大，但「人去我亦去」，而且感到從軍是很威風的事，加上當時又有紀念週，所以大家便去參軍。我們應該有三、四十人，報名參加了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。

我在體格檢查時，不達標，但都獲准參加。參加青年軍後，我離開了力中。在軍隊裡，有「三操四講」的訓練，訓練的地方好像在蕉嶺。訓練完畢，我們加入了救護隊，當時教養院的老師周謙潔、陳致一也參加了。我們高中的同學當了排長，而我就當上第七班的上士班長。訓練時我學護理，後來因為軍需之職懸空無人，我被編去軍需保管物資，大概是當總務吧。其實我算不上很能幹，只屬「紙上談兵」的那類人。

復員

我沒有親身上過戰場。1945 年和平後，我們便復員了。我是第一批復員的。我們聚集在廣州市廣大路的集中營，在那裡等待遣散。那時愛讀書的便去讀書，要工作的便去工作。我選擇讀書，去了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繼續升學。[3]

回到廣州後，媽媽已經來了香港，想申請我到香港定居，和家人團聚。但因為內戰，申請截止了。1949 年畢業時，我想來香港，但共產黨又到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我已經不能申請了。畢業後，因工作需要，我曾去市幹校學習。我的先生不是青年軍的，而是國民黨軍隊的，但他也是教養院第六院的同學，因此彼此相識時間很長。我去力行中學的時候，他在少年軍校從軍。我們在香港參加同學聚會時重遇，後來我們一同返回廣州。我的人生也算曲吧！

[3] 廣東省立廣州女子師範學校，原名官立女子初級師範學堂，1907 年創辦。抗戰勝利後，學校為黃埔中正中學佔駐，故遷往登峰路越秀山麓原省立女中復校。

盧佩琼 (2008)

盧女士珍藏蔣介石墨寶

力行中學照片 (1945)